册；几乎与孟先生同时开始，是吴晗同志也通观《李朝实录》，抄成《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凡十二册，前一两年才由中华书局公开出版。两先生皆已作古，而读书之多，抄书之勤，犹然典型宛在，长留后学景行之敬。

尤所跂望者，我们即应效法前哲通读实录，抄录实录之成规，孟、吴二先生既抄《李朝实录》于前，我们也应学习谈、万二公通读明列朝实录之法，最低限度能将清列朝实录通读一遍，将其中有关历史事物的记载分类抄录出来，按年、月、日排列，作为进一步研究清史的参考资料。今兹提出，愿与同志们共勉之。

为清史研究进一言

来 新 夏

清朝在中国历史上居于相当重要的地位。它是最末一个封建王朝；它是中华民族的融合者；它也是封建文化的总括者……。但是，过去由于辛亥革命时期强调反满宣传的某些影响，使清史研究的进展较为缓慢。近年来，情况大有改观。去年九月举行的全国第一次清史学术讨论会就是一种明证。从大会收到的近七十篇论文看来涉及到阶级结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方面，有不少成果。不过，若能以此为起点，延伸开拓，定将使这一重要史学领域出现更为绚丽多姿的风采。我躬逢盛会，受益良多，也愿借此略贡管见，期备采择：

(一)研究新课题：这次会议论文的课题范围比较广泛；但从编写一部清代全史来说，原有课题可作新的伸展，而未涉及的课题也亟待开拓。即如阶级结构问题，近年来的文章论述农民、地主、雇工和游民较多；但对商人论述就较少。康雍乾时期的商人，我看主要有垄断商人（盐商、铜商、行商）、大商人（米商、木商、布商、批发商等）、一般铺户商人和小商小贩等四种类型，对他们的基本面貌就缺乏较完整的描述。这时商人地位有所提高，但如何提高没有足够的说明，是否可从官僚（高士奇、王鸿绪）士人（钮匪石）的经商，商人的作官（汪启淑），社会上的意识观念中对商人的拜倒（拜门求助、联姻结纳、交往礼遇）等方面作些探讨？又如对城市居民中各色人等（如医生、塾师、卖字人、办婚丧事者、家庭手工业者、厨师、埠夫、装水烟人）的剖析。对于游民的研究多注意穿州过县和老林棚民；但游民的其他出路则未多顾及，如说唱艺人、跑马卖解者、乞丐、迷信职业者、长随跟班、地棍流氓（这类人遍及全国，各地有专称，福建称“聊落”，江南称“泼皮”、江西称“棍子”、广东称“泥腿”，他们对社会起破坏作用）。在政治方面研究事件典制者多，其中有需要更多探讨者，如中央集权究竟是强化统治呢？还是表明统治力量在削弱？统治阶级内部斗争除康熙与鳌拜问题、雍正夺位问题涉及较多外，其他乾隆朝党争、道光朝政争、咸同间的“祺祥政变”，光绪朝的帝后之争以及满汉官僚之争、督抚同城之争等等都值得进一步考察。在文化方面，这次会议讨论了乾嘉学派的评价问题，但有些问题还可深究，如乾嘉学派的校勘、考证、版本、金石、训诂、音韵诸学是否有阶级属性，还是一种纯技能。辑佚学的恢复古书面貌是否与乾隆的禁毁古籍在客观上起到抵制与反抗的作用等等。

(二)发掘新史源：研究历史需要史料已是常识问题。正经正史等基本史料应该首先掌握

也无容置疑；但要编写一部清史则史源犹如能源似宜多多益善。多发掘一些源头，那么自然可以源远流去，川流不息，巧妇可作有米之炊。不妨举几项例子说说。

档案既较原始，又兼量大，即以一档而论档册当在千万件之谱，是取用不竭的宝库，近年来多被采用，有许多同志穷年累月，搜捡研讨，取得了成效。

方志占古籍十分之一，清志又占方志总数80%，即6500种左右。其中虽有糟粕，但也有可用之料。凡风俗习惯、民生利病不详载于正经正史者都借方志而获保存。各地方志多有清代赋役记载（陆陇其的《灵寿县志》）。嘉庆《增城县志》记客民来历；光绪《潮阳县志》记畲民情况；乾隆《新安县志》记工匠日价；湖北《竹溪县志》、陕西《大荔县志》和河北《东光县志》等记同治元年、十年两次北极光景象。诸如此类，多可供采择。

谱牒是近年来受到注意的一种史源。现存宗谱尚无确切统计，从国家档案局的存目看已有四千多种。有的宗谱很完整，如宜兴任氏宗谱自明景泰直至民国十六年，经二十六代，重修有十三次。从宗谱中不仅可以看出社会状况、人口状况，而且有的宗谱还附有年谱、碑传和文集等等颇资考证。有的还解决疑问，如《华亭王氏族谱》附《鹤间草堂主人自述苦状》一篇，从中知道《溃痛流毒》的辑者鹤间草堂主人名叫王清瑞的生平。清人年谱数量也近千种，有一些有用资料，如《赵客亭先生年谱略》记康熙四十八年河南卢氏棚民反抗事迹为其他记述所未及。

笔记是一种具有私人档案性质的著述。它的材料经过验证后都较生动具体，涉及面也较广。如《阅世编》一书记康熙元年至二十七年十四种物资的价格，可以从中看到物价的升降。其它为社会情况，民风习俗的记述都有为他书所不及或语焉不详者。

文集数量既多，内容也丰富，实为不可漠视的史源。如《内自讼斋文集》之记王聪儿始末。王昶文集之记军机处典制，钱大昕、洪亮吉、汪士铎等文集均有政治、文化等方面记述。

如果把这些史源分头开掘，汇为巨流，那将是一椿仓廪实、府库充的大好事。

（三）编制新工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过去虽有一些（如《清代职官表》），但还不够。要多方编制新工具书。这项工作不仅为开展研究工作铺路搭梯子，而且本身就是一项研究工作。福建师大图书馆同志正进行编制的《二十八种通志人名索引》就是一项重大科研成果，其中有一部分可供研究清史使用。编工具书对研究工作者本人也极有好处。我过去刚进入清史研究领域时，就用了不短的时间，翻读了九百来种年谱，随手写了提要。这样不仅自己对清代许多重要人物了然于怀，奠定了一点基础，而且这部工具书还为他人节翻检之劳，真是“天增岁月人增寿”的善举，又何乐而不为？这方面余地很大，地方志中清人索引就无人编。又为清人文集确数难知，仅我所知就有二三千种，但王重民先生的篇目索引不过四百余种，张舜徽先生的《清人文集别录》也只有六百余种，大有重编必要。这种摸清底数，扫除障碍，加速进程的工作实在是当务之急！

（上接封四）

在这次学术讨论会上，大家一致认为李善兰是中国近代科学的先驱者。会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派人去李善兰的家乡浙江省海宁县硖石镇深入调查研究，查阅了李善兰的家谱，访问了他的族人后裔，搜集了李善兰的轶闻趣事，掌握了更多的李善兰从事学术活动的情况，对李善兰的生平事迹和科学成就的研究工作可望取得更进一步的成果。